

文化被视为人类跨越自然的实力或从力量王国奔向自由王国的一种中介,它历来被赋予一种超自然、超物质、超实力的精神特质。具体地说,文化作为人类自己创造的符号表意系统,它总是指向社会的一种高雅的和精神性的目的,而政治、经济、军事、贸易、外交等似乎都被视为是达到这种高雅的精神目的的手段而已。原因不难理解:文化更多地被理解为特定时代精神或理智发展的最高境界或水平的标尺。由此,文化总有超越于具体“物”之上的高雅精神特质,“要追求内涵意义”。文化正是要通过创造符号表意系统,去追寻超越于具体“物”之上的精神内涵或内在意义。如果说,自然代表人类的外化的、实力的或物化的状态,那么,文化则代表人类的内化的、精神的或心灵的状态。

但是,近十年的艺术新景观,却让我感受到文化的某些与此不同的别样风貌:文化似乎正越来越经常地和偏好地指向它原本应当尽力超越的现实的“物”,并且还竭力展示它的影响现实生活的“实力”,而非原本被强化的精神之力。马克思早就揭示商品社会中劳动关系已被商品

艺术与文化的物化年代

化或物化了,出现了“商品拜物教”。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卢卡奇发现,资本主义社会已把“商品拜物教”进而演变成社会关系中的普遍的“物化”(reification)状况了。过了大约半个世纪,鲍德里亚则从“物”的象征意义的需求出发探讨消费社会及消费文化,发现“富裕的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人的包围,而是受到物的包围”。丰盈的“物”对消费者来说不仅仅是生活的实用物品,而同样是其日常生活中的丰富的想象、欲望、幻想等的投射处,当然也是其现实社会身份和地位的表征。

文化的物化年代,或许暂且可以作为对一种文化意识或文化理念新趋向的描述性术语来使用,指的就是文化的内在精神功能被弱化而其外在的物化功能被强化的带有一定普遍性的演变状况,也即人们的符号表意系统或象征形式系统的价值取向,不是指向内在精神世界而是相反指向外在物质世界。当各种文化产业以其艺术产品争先恐后地满足人们对“物”的追逐、窥视和占有等欲望,通过直接指向现

实的“物”而赢得票房、收视率、上座率、销量等时,我们难道不正是置身在文化的物化年代?只是这里的“物化”(thingification)与卢卡奇意义上的“物化”(reification)虽然在内涵上相互关联和延续,但所指已有重要变化了。如果说,物化在卢卡奇那里主要是说人与人的关系普遍地被演变成人们之间的物的关系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那么,物化在我们这个时代则是指不仅劳动或社会关系被普遍地物化,就连原本以为可以超越于物化之上的文化也直指事物、实物、财物或东西本身了,也就是说连艺术符号表意系统的象征性或表征性也被物化了或直指现实中的物或实物。艺术作为文化的主要形态之一,本来是要超越人类的自然或实物层面而提升到精神高度,但现在却反过来把人重新拉回到自然或实物层面。这样,作为市场经济时代的文化产业,艺术凭借商品、技术、身体等手段日益凸显“物”的诱惑力,从而越来越蜕变为与“物”纠缠不清的经济、产业、技术等行为。面对这样的物化现实,当前美学及艺术学何为?问题就提出来了。

摘自《中国图书评论》第8期 王一川 文

城市,让谁的生活更美好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结晶。美国现代哲学家路易斯·芒福德说:“城市是用来流传人类文明的成果的。”然而,近半个世纪,在“经济增长”和“GDP主义”的狂热追逐下,城市化以“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速度大兵团、成规模地推进,“人类文明的成果”是否能流传,成了一个悬念。

放眼神州,到处都是推土机和吊车奔驰的身影:大规模的城市拆迁与农村征地运动形成了一股狂潮。很多城市的改造或扩张面积动辄几十平方公里,有的甚至要把整个城市都拆掉。这一点,3月25日联合国发布的《世界城市化展望2009年修正版》有佐证。报告称,中国是在过去30年中城市化速度最快的国家。全球拥有5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中,四分之一都在中国。

中国无可置疑地成为全球最大的拆迁工地和建筑市场。然而,如脱缰之马的圈地运动和城市化进程,真的让我们的生活变得美好了吗?

如果正视现实,我们就会发现一些不容回避的问题。

在城市,近日发布的一份名为《中产家庭幸福白皮书》显示,经济最发达的深圳、北京、上海、广州幸福指数最低,成为中产家庭心中“不够幸福”的城市。原因无外乎几个关键词:房价、交通、教育等。

对于房价,国外某媒体的一个标题很形象:《我听到年轻人在房价下呻吟》。现在北京的房价均价已经在3万元左右。一个年轻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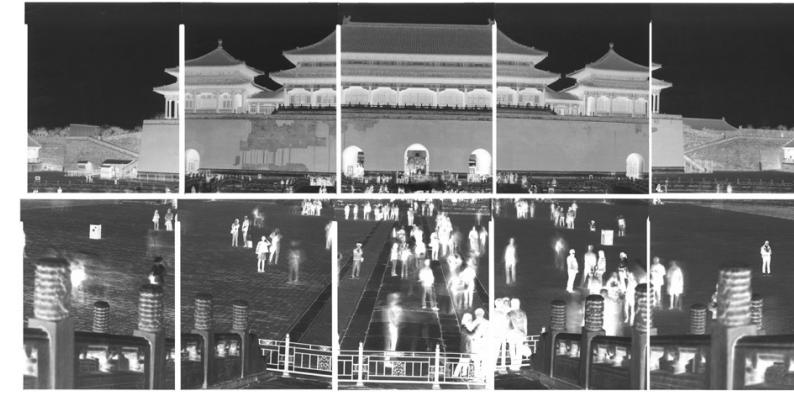
要想在北京买一套房,需要不吃不喝干50年。这还是按90平方米以下,每月5000元以上的收入来算。成千上万的蚁民蜗居在低矮潮湿的出租房里“望房兴叹”,“在地铁站里要靠保安推才能挤进车厢。进去之后,被迫呼吸闷罐子里N合一的人肉气味,觉得自己逐渐变成午餐肉”。这是网友在博客里记录北京地铁的情景。

一方面是畸高的房价、拥堵的交通、高昂的教育成本,一方面是疏离的人际关系、巨大的生存压力、激烈的工作竞争,我们看到了一个个城里人面无表情、步履匆匆。逼仄的生存空间压迫着人们的情感园地,要么荒芜干涸,要么杂草丛生——发自内心的微笑已经成为稀世表情——优雅、从容、美好,只能在街头巨大的房地产广告上美女的眉宇间寻找了。

联合国人居组织在1996年发布的《伊斯坦布尔宣言》中说:“我们的城市必须成为人类能够过上有尊严的、健康、安全、幸福和充满希望的美满生活的地方。”那么我们的城市怎样“成为人类能够过上有尊严的、健康、安全、幸福和充满希望的美满生活的地方呢”?一个一睁眼就要算计今天必须挣够340元才够交按揭款,一大早就打仗似地冲进人山人海的地铁站,到夜深人静时才能把自己的躯体扔到潮湿的出租屋里的,会感受到“尊严、健康、安全、幸福和充满希望”吗?会认为城市让他的生活更美好了吗?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作为一种理念很不错。关键是,城市让谁的生活变得更美好?如果仅仅是土地供应方、官员、煤老板、温州炒房团、富二代和房地产开发商,如果市民和村民的生活因为城市化反而变得贫穷、拥堵和荒凉,那么,我们就很干脆地回答:这样的城市化,我们不要!

摘自《杂文月刊》第8期 含辛 文



故宫午门(摄影) 程玉杨作
选自2010年第十届中国平遥国际摄影大展参展作品

WENZHAI

文摘

我们需要有理由的宽恕

菲律宾人质劫持事件显示了当地警方行动上的多种问题,问题产生于最需要改革的结构深处,自阿罗约时期就开始了。但是如果要宽恕,先要对各种错误的行径进行完整的揭示和反思。

其实放纵舆论,中国民众这一次的愤怒是理性的。直到现在,这些愤怒不仅没有对中菲关系产生巨大负面影响,反而会让一个国家在悲伤中更加成熟。

而反过来说,宽恕可以,但需要一个理由。这个理由不是我们自己找到的,而是菲律宾方面用实际行动提供给我们的。目前来看,菲律宾方面表达了一定的诚意。但是其解释还完全没有达到宽恕所需要的程度。真正的宽恕,应该是在合适的时候表达合适的情绪。在菲律宾国会的听证会上,从马尼拉市长到警察总监,都没法对此次人质劫持事件的解救工作做出合理的解释,甚至还有进一步的辩解或者推卸责任之嫌。的确,在今天的国际和国内社会,我们不能简单地用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来面对每一个问题。因为在社会的转型期,矛盾的出现有复杂的对象,比如此次

菲律宾人质劫持事件显示了当地警方行动上的多种问题,问题产生于最需要改革的结构深处,自阿罗约时期就开始了。但是如果要宽恕,先要对各种错误的行径进行完整的揭示和反思。

宽恕是成熟社会心理中的关键一环,但也是最后一环。在调查、批评、问责都没有完成之前谈宽恕,这种宽恕就会变成纵容。或者这种宽恕只能暂时让愤怒被淡忘、被埋藏,而不能完全放弃仇恨。另一方面,宽恕者本身顶着巨大的悲伤和心理压力,宽恕本身是对这种情感的升华。在合适的时候给予宽恕,才能让被宽恕者感到这些悲伤和压力,让他们珍惜这种宽恕。否则,我们的宽恕就会成为忽略的借口。

对于越来越多的涉外安全命题来说,如何建立一种成熟的公民心态更为关键。这能够帮助一个国家更加重视公民的海外安全,提供一种更加合理的保护机制,也能够让国际社会更加意识到中国对自身公民的爱护,从而尊重我们和我们的选择。

摘自《新京报》8月28日 周庆安 文



幕后黑手

选自新漫网 RUYI 作

依法治理农村孩子辍学问题

依法治理农村孩子辍学问题遭遇法律“软肋”,政府难作为,家长想不通,孩子受侵害。看似简单的问题,实则挺复杂。

辍了学,不知道由谁来告,是最大的“软肋”。虽然有宪法和义务教育法、民事诉讼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但我国现有法律对辍学的诉讼主体仍缺乏明确界定。根据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提起诉讼的原告必须同被诉侵权行为有直接利害关系。这就产生了一个悖论:侵害子女受教育权的父母不可能到法院去起诉自己。孩子又多是法律上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常常不能、不会、不敢去提起诉讼。在这种情况下,建议是否可以考虑修改现行法律,明确辍学事件的诉讼主体。

行政不作为、执法不严是造成农村学生辍学严重的又一“软肋”。现实生活中,因重大事故、案件、事件被问责的党政领导干部屡见不鲜,但因辍学事件被问责的却极少见。如果“引咎辞职”问责制能落到实处,解决辍学问题或许不再困难。

人大监督的缺位,也使解决农村学生辍学问题失去必要的制约。人大代表在一线,理应最了解基层包括农村孩子辍学的情况,各级人大对政府各项工作有监督权,有责任督促政府履行职责。尽管这些年,各级人大都进行了义务教育法或未成年人保护法的执法检查,但成效仍不尽如人意。

当然,农村孩子辍学问题的根本解决,仅靠法制还不够,归根结底取决于农村经济的发展。但经济与教育互为因果,且教育居于优先地位。有的地方就很善于通过各种方式,提高农民的教育意识。让农民自己教育自己,恐怕是解决问题的治本之道。

摘自《人民日报》9月1日 张炼 文

警惕奖杯上面的西方文化霸权

被称为“我国首部原生态电影”的《好大一对羊》是根据夏天敏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尽管影片相对于原著而言,苦难叙事有弱化的倾向,但是从整体看,还是属于“底层文学”叙事范畴。

《好大一对羊》在云南山区取景拍摄,“追求了无痕迹的原生态的造型叙事”或许正是该电影的取胜之道。导演刘浩带着本片先后受邀出席多个国际电影节,并获得多项大奖。电影旨在以“实录”手法向国际影坛展示中国“当前”的农村生活。但影片的“底层叙事”显然不能作为中国当前农村生活的代表,更不能作为中国当前生活的代表。而在国际影坛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霸权是将中国乃至东方编码在第三世界的文化等级中的,“以西方他者的编码来看,中国的农村生活才能够代表中国生活的实质”。从这一立场看,电影提供给西方他者的是生活的“原生状态”,现实与作品的距离消失了,艺术的典型性减弱了,在这样的观赏过程中,形象失去了真实感。

从现实主义创作的立场上看,影片的现实性不足,这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影片对苦难叙述进行“泛化”的处理。第二,影片对苦难叙述进行“软化”处理,温和地对待“他人”的受难。第三,电影改编未能将原著寓言式的故事演绎为真实的“现实生活”,不足以对电影文学与现实生活的正常关系给予有效的说明。影片的现实性不足,使影片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中国本土文化的真实性,其底层仍然是所谓的异国生活情调占主导地位。究其根源,与叙述者用“新奇”取悦国际影坛的理念有关。

影片在对苦难内部精雕细琢的同时,将主人公德山因生存苦难而凸显出生命的卑微用质朴来粉饰,以期取得一种“民族叙事”,而对于“质朴”表象背后的认知性——他从来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和别人的平等地位这种精神上的麻木却被忽略了。在国际影坛上,人们认为影片反映了中国社会的重要角色之一——农民,反映了他们的朴实和美好愿望,让世界更加真切地了解了中国(网络评论)。显然,“媚俗”的程度远远超过制片人原先的预想。同时,电影中人物很少用自己的眼光来看世界,容易丧失对“人”的价值的尊重,而使人物从叙述者的角度陷入被动和卑下,从而也使观众——尤其是国际影坛的观众——因为缺乏可以沟通的共同的文化纽带,而带上居高临下的俯视姿态。当这样的影片在国际上频频获奖的时候,我们该警惕奖项之上的文化霸权主义了。

摘自《南方文坛》第4期 梁华 文

孙见坤升学受阻刺痛了谁

凭借在国学领域的钻研精神和过人禀赋,陕西省西安市高三应届生孙见坤征服了复旦大学的教授们。为此,8位教授希望学校破格录取孙见坤。但因高考成绩6分之差,陕西省招办拒绝为孙见坤投档。

虽然处理此次事件的态度值得商榷,但陕西招办维护高考公平的初衷勿庸置疑。与其说陕西招办没有“网开一面”的勇气,不如说现行的招生和教育制度缺乏“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机制。

在注重均衡发展、紧盯考试成绩的应试教育体系下,严格的招生规则难以被改写。由此一来,孙见坤等身怀特长者之遭遇便不足为奇了。对于孙见坤的遭遇,国学大师钱穆的女儿、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钱易感叹道,正是在当时单纯而开放的教育体制下,她的父亲钱穆和堂兄钱伟长才有机会在各自的领域取得不俗的成就。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当年钱钟书、吴晗和季羨林三位大家的高考数学成绩分别是15分、0分和4分。然而,“瘸腿”的成绩并未妨碍他们进入清华大学,得益于“兼容并包”,三人最终成为大家。反观今天,在惟分数论成败的体制下,只有突出特长而总体成绩不好的考生,恐怕唯有想入非非。

在当今时代,一位高中生能甘于寂寞、置身于故纸堆里钻研,本是一件难能可贵、值得褒扬的事情。复旦大学对陕西招办好言相求,甚至不怕吃闭门羹,其背后是爱惜人才的责任感。遗憾的是体制不健全,双方只有扼腕叹息。

更令人担忧的是,今后还会有多少潜在的“千里马”遭此境遇?不尽合理的体制刺痛了少年的心。我们在对孙见坤的遭遇感到惋惜之际,更希望他的遭遇能够刺痛现行教育体制的神经,从而推动体制不断健全,在兼顾公平的同时真正做到兼容并包。

摘自《光明日报》8月30日 朱小龙 文

新旧两版《红楼梦》谁更“忠实”

1987版电视剧《红楼梦》播出后,观众与专家指出的一个问题是“写实有余”而“诗意不足”。这其实也是时代潮流的影响。关于写实问题,导演王扶林在题为《荧屏(红楼)》,何以如此的文章中表述了自己的创作思想,他认为小说中那些虚幻迷离的成分都是“假语村言”,揭露现实才是作者主旨,因此删去了女娲炼石补天、梦游太虚幻境等部分。同时,还删去了涉及“通灵宝玉”的“迷信成分”,却根据脂批增加了写实的“淫丧天香楼”。这样,“通灵宝玉”、“风月宝鉴”也就失去了其含蓄的韵味,更显生涩。本来新剧应该吸收87版经验而有所超越,可惜结果很遗憾。新旧两剧都是“忠实原著”,但在“如何忠实”上却分出了伯仲。如果对原著的精神缺乏深刻理解,所谓忠实只能停留在表面上。

1987版电视剧存在的问题,虽有受制于时代的缺憾,但它自身的优秀已经造就了在大众心目中的经典位置。它的精雕细刻和流光溢彩都缘于秉承“忠实原著”而来的严谨态度,虽然时代思潮多少局限了这种“忠实”所能达到的高度,但创作态度之严谨保证了这一局限能从其他方面得以弥补。而新剧“忠实原著”过多用了表面功夫,传达的向慕传统却未免有些买椟还珠的浮躁心态,尽管也不乏优点与独到之处,却难免受观众诟病了。

国府”一节,新剧一方面是刻板按照原著铺叙,另一方面却舍去了很多显示探春之才的细节,而一味突出宝钗。虽然小说中有“识宝钗小惠全大体”之语,但“敏探春兴利除宿弊”才是主脑,新剧的情节取舍与安排显得对原著把握不够,透露了创作思想上的混乱。可以说,它在“忠实原著”方面只能算是下了些表面功夫。同时,主创可能认为大部分观众不熟悉《红楼梦》,于是加上了太多的旁白,以至于令人有听“小说连播”之感。还不说新剧中最成问题的演员演技,以及被人诟病的音乐,比如87版成功的人物形象塑造与被称为“绝唱”的音乐,更是相差悬殊。本来新剧应该吸收87版经验而有所超越,可惜结果很遗憾。新旧两剧都是“忠实原著”,但在“如何忠实”上却分出了伯仲。如果对原著的精神缺乏深刻理解,所谓忠实只能停留在表面上。

1987版电视剧存在的问题,虽有受制于时代的缺憾,但它自身的优秀已经造就了在大众心目中的经典位置。它的精雕细刻和流光溢彩都缘于秉承“忠实原著”而来的严谨态度,虽然时代思潮多少局限了这种“忠实”所能达到的高度,但创作态度之严谨保证了这一局限能从其他方面得以弥补。而新剧“忠实原著”过多用了表面功夫,传达的向慕传统却未免有些买椟还珠的浮躁心态,尽管也不乏优点与独到之处,却难免受观众诟病了。

摘自《人民日报》9月4日 祝宇红 文

非物质文化遗产流失首因是公众保护意识不强

8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草案)》及草案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据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清研咨询对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3363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73.5%的人表示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12.6%的人“非常了解”,还有25.4%的人表示不太了解。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问题是什么?调查中,“公众参与不够”(72.0%)、“地方重申报、轻保护”(69.8%)、“缺乏立法保护”(69.3%)排在前三位。接下来还有:商业化严重、传承人缺位、外来文化和现代文化冲击、宣传力度不够、缺乏专家参与,保护无序、资金匮乏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评审专家委员会主任冯骥才说,目前不少地方官员把“非遗”看成文化政绩,一旦列入“非遗”名录,也会给当地带来巨大的旅游效益,所以全国各地花巨资申遗的现象屡见不鲜。“说进入‘非遗’名录,就应该有更严格的保护,但现实情况往往成了保护的结束。”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朝戈金认为,“非遗”保护的主要问题是“四重四轻”:重申报、轻保护;重开发利用,轻深入研究;重经济效益,轻文化内涵;重一时举措,轻长期规划。本次调查显示,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流失的原因,85.5%的人首选“公众保护意识不强”;74.7%的人认为是政府保护力度不够。冯骥才认为,国家的“非遗”保护目前已经形成了体系。首先是政府保护,除了正在完善的法律之外,还有国家对“非遗”的认定,认定之后政府会对传承人有一定的支持;第二是专家保护,帮助政府和社会认识到非遗的意义;第三,很多城市建立了“非遗”保护的博物馆。朝戈金认为,“非遗”保护的主要责任在政府,但是从深层次和长期角度看,责任在公众和社会。

摘自《中国青年报》8月31日 王聪聪 文

打倒“神医”『神道』

“神医”唱罢,“神道”登场。李一很出名。但是,他的出名却是以特异功能的行骗手段来完成的。所以,打倒李一,对于一些部门来讲是义不容辞的。一方面,打倒江湖骗子,破除社会迷信;另一方面,还老百姓一个干净的看病空间,就是所谓的净化社会空气,更要让李一们的粉丝赶回到正规医院去看病。

在“强奸罪”的名义下,相信李一也没少蹦跶的兴头了,继而,他从此就可能退出我们所有人的视野。只是,问题就来了:为什么在科技文明、法治文明如此发达的今天,老百姓总喜欢相信“江湖骗子”呢?为什么我们周边的“神医”、“神道”总像“打地鼠”游戏一样,打完一个又冒出一个?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根绝江湖骗子呢?果真是因为我国民众愚昧、热爱迷信、如梁启超先生所说的“民智未开”吗?

需要明白,信张悟本、李一的人中,有不少是高学历的精英人才。所谓“民智未开”,放到百年之前说可以,放在现在说,不可以。更主要的问题是,公众的信仰永远是守恒的——正如古人讲的“远虑”与“近忧”的关系一样,公众信仰“江湖骗子”的同时,定然对该信仰的东西有所怀疑。体制之内该给老百姓以健康的所谓医疗,已经失去了本应有的市场和公信力。

面对养生,我们该信谁?根本上讲,我们该信现代医学,该信“人民医院”,更该信时下比较热议的新医改,但是,现实